

外交话语技巧与国家安全危机的化解

胡 键

摘要：习惯于丛林法则思维的人大多认为，国家安全危机化解的关键手段就是国家的实力，甚至只是武力。但是国家实力并不是确保国家安全和化解安全危机的唯一手段，国际关系的“安全困境”表明，在国家实力之外，化解国家安全危机还有其他有效的手段，即话语技巧的使用和语言功能的发挥。外交话语视域下，国家安全危机大致可以识别为：舆论攻击、经济制裁、战争威胁、军事包围。这四个方面即便在最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军事包围，只要战争还没有打响，那么外交行为就不会停止，话语化解安全危机的可能性就依然存在。话语化解安全危机的方式主要在于话语技巧的使用，即把话语技巧嵌入外交声明、说服、辩论、反驳等话语实践中，使不可能的和平变成可能的和平，使可能的战争成为不可能的战争，从而大大降低国家安全成本，维护国家安全。

关键词：外交话语；话语技巧；国家安全；安全危机；国家安全成本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3）04—0070—09

一、引言

把话语技巧与国家安全危机的化解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无疑会让不少学者纳闷：话语怎么能与国家安全结合起来？人们可能会质疑：侃侃而谈能够化解国家安全危机？然而，回顾人类历史会发现，即便是在聚落、部落时期，安全危机也并非都是用实力来化解的，有众多安全危机是用语言和话语技巧来化解的。至于到诸侯国以及现代国家时代，话语技巧在调节国家（诸侯国）间关系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只是当今的人们习惯于“权力”尤其是“武力”，也习惯于丛林法则思维，大多以为国家安全危机化解的关键手段就是国家的硬实力甚至只是武力。然而，国际关系（包括中国古代诸侯国间关系^①）中的“安全困境”，始终是大国成长难以克服的问题。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强调以硬实力为手段的斗争，也讲究以软实力为内容的斗争技巧。

语言学尤其是应用语言学，一方面是指对本族语言、第二语言、外国语的教学研究，但广义的应用语言学研究更强调对与语言有关的实际问题所做的研究。话语技巧的研究属于应用语言学范畴，这一研究在国内主要是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以后逐渐兴起的，但最初主要集中在争夺话语权的研究，尚未关注话语技巧的研究，即便有所涉及，也主要是在国际商务谈判中体现，关于国家外交战略层面的话语技巧研究前期几乎没有。但是，这一问题在形塑国家形象的时代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国家形象在国际

作者简介：胡 键，男，上海政法学院国家安全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战略文化安全研究。

^① 本文讨论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话语，但文中大量的例证是有关中国古代诸侯国之间的问题，本文不是将中国古代诸侯国当作“国家兼外交”来套用，而是因为古代中国诸侯国国家之间的交往与当今国际社会交往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可比性。

上被认知,首要的自然是国家发展水平,其次就是国家对外交往的话语呈现,也就是所谓的话语技巧。安全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基本研究领域,安全研究既有其自身的理论工具,也有其基本的研究范式,相关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不过,安全危机化解的研究基本上置于危机管理的范畴之中,而危机管理是指风险尚未爆发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当危机爆发后,研究就进入危机应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同样有理论工具和研究范式。无论是话语研究还是安全危机研究,都是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与重点。本文专注于话语技巧在风险临界点的危机化解之术,这是一个全新领域,单一的理论工具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阐释,需要多学科的理论工具和理论范式作为支撑。鉴于此,本文采用文本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即把当代的外交话语置于历史之中来剖析国家安全危机的化解技巧,以历史主义的视角兼顾共时主义的理论范式,也就是所谓的“政治学回到历史”,或者说用和黑格尔所说的“反省的历史”^①来探讨国家安全问题。当然,研究追述历史,绝对不能让历史的现象成为研究的羁绊,更不能沉浸在历史的事件之中,而是要从历史的现象之中获得相关的历史昭示,为解决现实问题尤其是化解国家安全危机获得某种借鉴。

二、外交话语所关涉的主要国家安全危机

广义而言,国家安全危机的种类繁多,类型复杂,本文讨论的主要是外交话语如何化解以下几种安全危机,即舆论攻击、经济制裁、战争威胁、军事包围。根据危机的程度来排序,这四种安全危机的危险程度是由轻到重、由低到高不断加强的,那么在处理这些安全危机的过程中,外交话语究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从客观实际来看,只要危机还没有爆发,或者说只要双方的冲突还没有爆发,即便在临界点上的安全危机,外交活动就一直在进行着,外交话语在化解安全危机上就有可能发挥积极作用,也就是用语言与话语来实现军事手段所不能实现的国家利益。当然,在这种情形下,外交话语及其技巧就非常关键。舆论攻击就是舆论战,一般借助于各种媒体平台给对方制造各种话语压力,从舆论上污名化、妖魔化对方。反击的手段也必须是舆论反击,如何在舆论战中取得胜利,关键是话语技巧。经济制裁无论实施与否,关于经济制裁的争论一般不会因为经济制裁的实施而终止,相反经济制裁的实施会进一步加剧相互之间的舆论攻势,这同样需要话语技巧。战争威胁是安全危机爆发前的一种状态,但处理的方式和技巧将决定危机是否从隐性走向显性。其中必然有话语交锋,话语技巧也同样非常关键。军事包围使安全危机爆发处于临界点,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危机事实上已经爆发,但这并不意味着外交解决手段的时间已经结束,在这关键的时刻,外交手段依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形,历史案例虽然罕见但的确存在。话语技巧在这种危急存亡时刻更是决定了国家的命运。因此,外交话语技巧的确是化解国家安全危机的重要手段之一。

话语技巧源自于语言的“元功能”(meta-functions)。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观点,“语言有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与语篇功能,其中概念功能分为经验功能与逻辑功能。三大元功能通过不同的语言资源体现:概念功能主要通过及物性系统、逻辑关系系统等体现,人际功能主要通过语气系统等体现,语篇功能主要通过主位系统等体现”^②。语言自从被创造出来就具有强大的功能。西方的文献中较早涉及这个问题的是《圣经·旧约·创世纪》记载的关于“巴别塔”的传说。按照这个记载,人类最初都是持同一种语言的,共同谋划建造一座通往天堂的塔。耶和华对此甚是恐慌,因为一旦通天塔建立起来,人类就可以做任何事情了。于是,耶和华就下到凡尘扰乱人类的语言,使人类分散在各地且彼此语言不通。^③这样,“巴别塔”就无法建立起来,耶和华也将继续保持自身的神秘感。这个传说表明语言相通能使语言能够发挥最强大的功能。当然这也只是传说而已,人类语言事实上是种类繁多的。目前,安全危机有

① 黑格尔关于历史研究提出了三种方法,即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而“反省的历史”则是指“历史的历史,它是对于各种历史记述的一种批判,和对于他们的真实性、可靠性的一种检查”。实际上借鉴的历史也同样是“反省的历史”。参见[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7页。

② 何伟、仲伟:《从语言元功能的编码方式看英汉语本质差异》,《当地修辞学》2021年第5期。

③ 《圣经·创世纪》(中英文对照版),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舆论安全危机。这种危机一般需要舆论源，也就是具体的事件，当然，这种事件往往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从而由舆论引发信息政治时代的“象征政治”（symbolic politics）和“杠杆政治”（leverage politics）现象。^① 此类事件包括国家举办的重要活动、灾害事件、群体事件等，国家如果对这些事件处理不当，有可能产生舆论压力：一国内部的事件被外部媒体关注并直接产生重大舆情，返回来对国内政治产生重大舆论压力或舆论攻击。一般来说，国家面临的舆论安全危机包括这样两种情形：一是国家行为（包括国内行为和对外行为）所引发的舆论危机，这可能会引发对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质疑的问题，甚至成为外部国家干预一国行为的理由，而舆论则是进行干预的先导和合法性来源。例如，雨果·格劳秀斯第一个作了关于人道主义干涉原则的权威性陈述，即对人类或人性的凶暴摧残开始的地方就是国内管辖权的排他性终止的地方。^② 然而，在当代世界，当一个国家要干预另一个国家的时候，都以“格劳秀斯理性”作为理论依据。例如，1999年美国和北约在科索沃问题上就首先制造出“科索沃存在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的舆论，等等。诸如此类的舆论攻击，恰恰成为外来势力实施军事干预的借口。因此，舆论攻击是国家间一切安全危机的先导。二是在国家实力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增强的时候，外界就会制造出种种舆论，既有可能是因为对该国实力增强的惧怕，也有可能是对该国刻意妖魔化。这种情况在大英帝国崛起的时候就已经比较普遍了，霍布斯鲍姆就描述过这种情况，“当时的英国给外来访客留下的深刻印象是：这是一个富裕国家，主要因贸易和经营而致富；这是一个强大又可怕的国家”^③。这个“可畏”就是对当时正在崛起的大英帝国制造出来的一种舆论安全危机。当今中国遭遇的舆论攻击就更多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致命中国论”等，都一度甚嚣尘上。

第二，经济制裁。经济制裁是在历史上国际争端中一种常见的制裁措施，不过在不同的情况下，制裁的具体措施不一样。中国春秋时期，齐桓公要称霸诸侯，首先就是想攻下鲁国的南梁，并请教管仲，管仲给的建议就是经济制裁。后来，齐桓公要攻打楚国，也一样使用了这个办法，只是“奢侈性稀缺”的物品由南梁的“缣”改为楚国的“鹿”而已，结果一样迫使楚国屈服于齐。^④ 古希腊时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雅典攻打波提狄亚，由于柯林斯在波提狄亚有不少公民，所以柯林斯猛烈抨击雅典人。这时候的柯林斯已经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为了惩罚柯林斯，雅典伯利克里颁布了《麦加拉禁令》，禁止拉栖代梦人使用雅典的港口和市场。因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拉栖代梦人提出“首要的一点是：如果雅典撤销那个禁止麦加拉人使用雅典人的港口和雅典市场的麦加拉禁令，那么，战争就可以避免了”，但遭到了雅典的严词拒绝。^⑤ 在当代国际关系史的国家间争端中，经济制裁越来越频繁地被使用。最近的例子就是乌克兰战争期间欧美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几乎是一揽子制裁措施，如能源、投资、银行账户、出口、国际资金清算（SWIFT）等。

第三，战争威胁。战争威胁本身是一种较极端的外交手段或外交措施，这种外交手段在古代更为常见。例如，波斯帝国大流士征战希腊时在路上遭遇斯基泰人的抵抗，延误了波斯征战希腊的计划。于是，大流士给斯基泰国王伊丹泰尔苏斯写了一封信，要其献出“土和水”，所谓献出“土和水”就意味着威

① 所谓“象征政治”，就是用符号、行动或故事被广泛地知晓；所谓“杠杆政治”，就是利用强大行为体影响网络中较弱成员不可能发挥影响的情况。参见[美]玛格丽特·E.凯克、凯瑟琳·辛金克：《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韩召颖、孙英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19页。本文借用这两个概念是要表达这样的意思，一个事件产生了重大的舆论效应，并对国家安全引发了舆论危机，因而该事件被称为“象征政治”现象；假若这个事件又继续引发了连锁效应，由其引发的舆论效应导致更多的事件且又由这些次生事件引发更大、更多的舆论和危机，这个事件就具有“杠杆政治”意义。

② 时殷弘、霍亚青：《国家主权、国际道德和国际法——格劳秀斯的估计关系思想》，《欧洲》2000年第6期。

③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6页。

④ 黎翔凤撰：《管子校注·轻重戊》卷24，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14—1515、1521—1522页。

⑤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1、158页。

逼对方臣服。^①古代中国也有众多案例，举战国一例：秦王想以五百之地换安陵王五十里之地，但安陵王不愿意而派唐雎前往秦国谈判。秦王以武力威胁唐雎：“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然而，唐雎同样以武力威胁回应秦王，最终，“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②现代国际关系严格限制战争威胁，《联合国宪章》就明确规定了不以战争相威胁的国际关系准则。然而，事实上，战后特别是在两极争霸过程中以战争相威胁依然普遍存在，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以核战争相威胁，最典型的就古巴导弹危机。^③两个超级大国上演了一场空前的核战争威胁（核讹诈）。冷战后的战争（核）威胁更成为司空见惯的国际争端现象，在战争爆发前，战争威胁依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外交威慑手段，只是这种外交威慑最终可能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争端的一方太弱选择妥协从而使争端降温，二是争端的双方势均力敌从而导致争端走向战争。当然，还有一种结果是外交话语技巧促使双方走向和解。

第四，军事包围。本文将军事包围作为一种国家安全危机而不是战争，是因为军事包围在战争还没有正式打响之前，双方依然还有和解希望。最典型的就班超对贵霜的一次战役，汉和帝永元二年（90）贵霜王因求娶汉公主被班超拒绝，遣副王谢率军七万攻打班超。此时班超的部队处于绝对劣势，大家都非常恐慌，但班超分析指出，他们虽然兵多，但跋涉数千里翻越葱岭而来，疲惫不堪，只需收好粮食坚守即可，“彼饥穷自降”。果然，班超采取坚壁清野的方式，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从此以后贵霜王对大汉“岁奉贡献”。^④一般来说，军事包围事实上已经启动了战争机器，但如果外交斡旋成功依然可以终止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外交斡旋更多的是依靠话语技巧的施展。

三、语言的功能与话语技巧

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指出，语言在作为口头交流工具的时候具有这样一些功能：（1）通过语言的口头交流，可以“获得学术知识”；（2）可以用语言对获得的知识进行“商讨和互教”；（3）可以“使别人知道我们的意愿和目的，以便互助”；（4）“无害地为了娱乐和炫耀而玩弄词语以自娱和愉悦别人”。^⑤从这四点来看，它们所反映的是语言的正功能，即语言在交流中被正常使用情况。然而，人的欲望膨胀时会不择手段，包括滥用语言的功能来达到目的。因此，霍布斯也罗列了语言功能被滥用的四种情况：（1）用于欺骗自己；（2）用于欺骗别人；（3）用于“把并非自己的事物宣称为自己的意愿”；（4）用于“互相伤害”。^⑥当语言功能被滥用时，那么涉事的各方会把其所使用语言来侮辱对方，以达到伤害对方的目的，实际上同时也在伤害自己。因此，如果语言的功能被滥用，涉事各方就会陷入困境乃至绝境，结果必然是走向刀枪相见的局面；但语言的功能若发挥得好，则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不过，霍布斯笔下的语言功能是指语言本身所具有的交流功能，但语言作为人类交流的工具，它本身无法发挥这些功能，需要人们加以合理运用。语言被使用时就形成话语，话语的技巧就集中体现在使用语言的具体语境之中。

外交实践天然地与语言的功能联系在一起，通过话语技巧来发挥语言的功能，进而保障国家利益。当然，语言在用于具体的外交实践以及用于不同的目的，呈现出来的话语形式是不一样的，从既有的外交实践来看，语言的功能在外交上可以用于以下的目的：声明及释放己方信息；说服也就是劝服对方或可能的盟友；辩论主要是为了用话语赢得对方，以便获得有利于己方的社会舆论；反击则是指驳斥对方的不当话语，同时构建有利于自己的健康话语。

第一，外交声明一般都使用朴素的话语判断，把声明明确表达出来即可。但是，当面临安全危机如主权问题、领土完整问题的时候，一般的话语判断可能不足以强调问题的重要性，也不足以引起相关各

①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徐松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43页。

② 刘向集录：《战国策·魏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卷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22—923页。

③ 《赫鲁晓夫回忆录》，赵绍禄等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第487页。

④ 范晔：《后汉书·班梁列传》卷47，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80页。

⑤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9—20页。

⑥ [英]霍布斯：《利维坦》，第20页。

方的重视。鉴于此，声明的主体方就会使用一些话语技巧来强调。例如，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有充分的理由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然而，西方大国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无视中国的权益，外交代表顾维钧据理力争，并发表声明：“三千六百万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也。……于国防上中国亦断然不容他国之争执也。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本全权绝对主张，大会应斟酌胶州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①顾维钧在这里使用的话语技巧在于：其一，文化符号置换，即把中国孔子、孟子（分别为圣人、亚圣）出生地作为中国的圣地并与西方的圣地进行了类比，从而让西方理解中国对“圣地”的情感和其重要性。其二，借力打力，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大战尾声提出了“十四点计划”，其中的第十四点强调：国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顾维钧利用了这一点来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两点都让西方大国能够听懂中国的意思。因此，当顾维钧发言结束后，“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来向我祝贺。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②。虽然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了，但顾维钧的演讲非常成功，尤其是让西方的政治家们明白了中国的诉求。

声明实际上是证明一个事实，与此相反的是伪证一个判断，证伪相当于辟“谣”。外交话语的辟“谣”肩负着两个任务：一是用详细的事实证明消息的真实性；二是用详细的事实驳斥消息的虚假性。外交话语的辟“谣”不应该只是指出消息的对与错，这种简单的判断往往不能够取信于外界，反而会增加谣言的“真实性”。

第二，话语说服必须要有高超的话语技巧。由于言语的目的是要说服涉事的各方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在人的理性考量之下，若没有一种高超的话语技巧，任何人都会以自己的目的来确定自己的利益诉求。不过，高超的话语技巧往往能够打动人。例如，古希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在科基拉与科林斯之间发生了一场海战，虽然科基拉取得了胜利，但科林斯在随后的两年里获得了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支持，这让科基拉非常恐惧。于是，科基拉决定加入雅典同盟。下面我们来看科基拉是怎样说服雅典的：科基拉是中立国，投奔雅典“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但面临科林斯的威胁，科基拉“改变不结盟政策”，希望雅典能谅解；如果雅典帮助科基拉，“我们永远从心里感激你们”；在希腊，“除了你们外，我们是最大的海上强国”，所以“我们对于你们是有用的”。^③其他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雅典是海上强国，如果科基拉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话，对雅典来说则是致命的。因此，雅典在半推半就之下接受了科基拉的入盟。

第三，辩论不是吵架更不是辱骂，而是以理服人。辩论的目的，或者是证明自己的正确，或者是证明对方的错误。在辩论方法和话语技巧上，辩论最忌讳用否定对方的话语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因为在辩论方法上否定对方的话语只能是证明其错误性，并不能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如果辩论停留于此，那么往往会强化对方的辩论主旨。这是因为语言不仅具有指向性，而且还具有诱导性，而“被诱导出来的事情在听者那里无法处理其否定的事实，也就意味着人们的潜意识是无法确定或处理否定词的”^④。因此，如果只是否定对方的错误性却没有进一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会强化对方所建构的对己方不利的话语。这种辩论方法和话语技巧都是失败的。外交辩论不见硝烟，但唇枪舌剑远甚于战场上的硝烟。如古代诸侯国之间的“外交话语”：“渑池之会”上蔺相如的外交辩论，直到酒宴结束，秦王始终未能占赵国的上风。在话语交锋上，蔺相如与秦王之间的辩论围绕三个主题有三个回合，分别是关于弹瑟、关于史官记录和祝寿礼。蔺相如坚持对等原则，即赵王与秦王是平等的，所以赵王弹瑟，那么秦王也应该弹奏秦国的乐器，尽管秦国处于强势，但也不能失去了分寸。史官记录就意味着“入史”，若单方面记录了赵王为秦王弹瑟，那也就是赵王被矮化了。因此，蔺相如也把秦王为赵王击缶之事记录在史册中。秦国要求赵王以十五城

①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260—267页。

②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76页。

③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81—82页。

④ 胡键：《语言、话语与中国的对外传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为秦王祝寿，而蔺相如则要求秦国以秦国都城咸阳为赵王祝寿。尽管秦为主赵为客，且秦国强势咄咄逼人，但在这三个回合中，蔺相如通过自己机智的话语和行为维护了赵国的国家利益。

第四，话语反击实际上就是反驳。反驳绝对不是以恶毒的语言进行攻击，若是以恶毒的语言进行攻击，则必然会导致危机走向爆发的临界点。当然，反驳也不是以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来驳斥对方的话语。后面这种情况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是辜鸿铭当年驳斥“黄祸论”。德皇威廉二世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主张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为此，辜鸿铭用英文发表《文明与无政府状态》一文，以此来驳斥“黄祸论”。虽然辜鸿铭通篇一次也没有提及“黄祸论”，但他从欧洲文化深处来揭示欧洲文化的问题，他承认“欧洲和远东之间的确有一种文明之争在进行着”，但“这种斗争不是黄种文明与白种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更似一种远东文明与那种可称之为欧洲中世纪文明之间的冲突”，是“现代自由主义与古典中世纪主义的冲突”，因此，“不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冲突”，而是“部分欧洲人为将自己完全从古代中世纪文明中解放出来的斗争”。在辜鸿铭看来，欧洲人民要避免自己的毁灭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是为了获得新的现代文化去奋力抗争，要么就是回归到中世纪的信仰上去”，但很显然欧洲人民不会选择后者，最终只能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结果，连一向敌视中国的美国将军波博·埃文斯（Bobby Dunlop）都特地致函辜鸿铭说：“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你文中所写的每一个字，并相信这样做是值得的。最终，我在许多深怀兴趣的问题上站在了中国人一边。”^①支撑话语的是知识谱系和文化以及理论，辜鸿铭“从文化深处层层剥开，对欧洲文化的问题及其未来进行了透视，论证深刻且有强大的穿透力”^②。虽然辜鸿铭是以学者身份展开论述，也不是语言的直接反驳，但这种技巧和话语反驳的风格在外交话语反驳之时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四、话语技巧在化解国家安全危机中的运用

前文述及，诸多国家间的安全危机完全可以通过施展外交话语技巧而有效化解，关键是言者是否有能力施展话语技巧。面对舆论攻击、经济制裁、战争威胁、军事包围等国家安全危机，如何施展话语技巧化解这些危机呢，古今中外不乏成功案例。

第一，防患于未然，对可能的舆论攻击进行先期性的舆论防范。《尚书·甘誓》就记载了先期性的舆论防范内容，为了惩罚有扈氏的反叛，夏启说：“六事之人，予警告汝：有扈氏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③意思是指有扈氏不服启直接世袭禹的大位而造反，夏启为了表明攻打有扈氏的合法性而制造舆论，指责有扈氏违背了五行规律，怠慢和抛弃了天地人的正道。所以，上天要废弃有扈氏的大命，征战有扈氏就是奉行上天的意志去惩罚他们。上古时期的“汤武革命”所涉的两位历史人物都非常重视舆论攻势，一位是商汤，其在讨伐夏桀之前作《汤誓》，痛斥夏桀的暴政，“有夏多罪”，所以“天命殛之”。^④另一位是武王，其在伐纣时也用了同样的舆论攻势，他为了进行战前动员而作《牧誓》，并列举了商纣王的各种罪状，从而师出有名。由此可见，中国上古时期就非常注意舆论攻击和话语战的问题。从夏启、商汤、周武王的三篇文章的语篇分析来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以“天命”作为行动的理由，从“天命”中获得了话语权，也由此而获得了行为的合法性，而且“天命”是最关键的合法性。因此，箕子回应武王的问政指出，殷商之亡在于因上天震怒而“不畀洪范九畴”，最后致使“彝伦攸斁”。^⑤箕子还指出，不仅人是上天创造的，即“惟天阴鹭下民”，而且君权也同样来自上天，即君权神授。^⑥上古时期，“天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谁掌握了“天命”的话语，谁就占据了话语的主动权。

① 《辜鸿铭文集》（上），黄兴涛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169—184、185页。

② 胡键：《语言、话语与中国的对外传播》。

③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甘誓》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58页。

④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汤誓》卷8，第285页。

⑤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洪范》卷11，第445页。

⑥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禹贡》卷6，第446—448页。

第二, 话语技巧化解经济制裁的案例在历史上很少, 但并不是没有。《战国策·东周》有一经典案例, 东周打算种稻子, 上游的西周却不愿意放水, 东周很焦虑。这实际上就是西周对东周的“经济制裁”。于是东周派苏子去游说西周, 他对西周国君说: “君之谋过矣, 今不下水, 所以富东周也。今其民皆种麦, 无他种矣。君若欲害之, 不若一为下水, 以病其种。下水, 东周必复种稻, 种稻而复夺之。若是, 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 而受命于君。”西周果然放水, 以为可以淹没东周的麦子, 但却正好有利于东周本打算要种的稻子。^①其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势、交通不方便、信息不畅通是苏子话语技巧施展成功的重要原因。实际上, 西周并没有放弃对东周的“经济制裁”, 而是苏子以话语诱导西周对东周的诉求作出错误判断, 使西周实施错误的“经济制裁”措施, 而这种错误措施恰恰就是东周所需要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势在话语技巧实施中被经常使用, 而且成功的概率非常大。这体现了胡壮麟先生所说的: “交流信息要比交流物品与服务复杂得多”^②, 正是信息的复杂性为话语技巧的实施留下了空间。

第三, 在战争威胁之下, 话语的正面作用似乎难以施展, 而其负面的作用, 尤其是攻击、辱骂的功能往往会被全面展现出来。然而, 在这种情形下, 假若言语者从对方的利益角度出发, 柔中带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结果会出人意料。以中国春秋时期诸侯国为例, 据《左传》记载, 鲁僖公四年(前656), 齐桓公率领宋、鲁、卫、郑、许、曹等国的军队(相当于北方诸侯联盟)攻打蔡国, 蔡国溃败。接下来, 诸侯联盟想攻打楚国, 即对楚国发出了战争威胁, 于是楚国派使者前去交涉。其中有几段对话彰显了楚国使者的话语技巧。楚国使者说: “君处北海, 寡人处南海, 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您为什么想要攻打楚国? 齐国管仲似乎也振振有词: 周武王时就授予了齐国特殊的权力, “五侯九伯, 女如实征之, 以夹辅周室”。如今楚国不向周室纳贡, 所以齐国特地来问罪。楚国使者回答: “贡之不入, 寡君之罪, 敢不共给?”即楚国怎么会敢不纳贡呢? 这是双方的第一个回合, 齐国率领的北方诸侯联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 所以部队继续推进。楚国又派屈完为使者前去交涉, 齐桓公首先是对屈完施压: “以此众战, 谁能御之? 以此攻城, 何城不克?”。屈完则转换话题: “君若以德绥诸侯, 谁敢不服? 君若以力, 楚国方城以为城, 汉水以为池, 虽众, 无所用之!”结果, 战争不仅没有打起来, 齐国率领的北方诸侯联盟反而还与楚国签订了盟约。^③在第一个回合中, 齐国以周天子的授权为话语之源, 的确占据了上风。然而, 在第二个回合中, 面对齐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强大威胁, 屈完轻松地直插北方诸侯的软肋: 楚国有高山为城墙、有汉水为护城之池, 北方诸国军队虽然多但派不上用场。前面屈完强调的是正统性、合法性, 后面屈完则直接点出影响战争的关键性因素, 从而促使北方诸侯联盟不得不妥协。以一人之话语技巧而退诸侯盟军, 这不得不说话语技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 军事包围事实上就意味着战争已经开始了, 虽然如此, 只要战争机器的“鞋子还没有落地”, 那么外交就还有可能, 话语技巧化解危机空间依然存在, 这是弱势一方为维护国家安全所做的最后努力。在话语技巧方面, 春秋时期诸侯国家“外交”有诸多可以借鉴的内容。鲁僖公二十六年(前634), 鲁国与卫国、莒国结盟, 齐孝公发兵讨伐鲁国, 齐国军队已经到达鲁国边界, 军事包围基本上形成。鲁僖公派展喜前去退兵, 在齐国军队还没有进入鲁国的时候, 展喜就到边境去迎接齐军。展喜说: “我国君听说您亲自举贵步前来, 特派遣下臣来犒劳您的左右侍从。”齐孝公问展喜: “鲁国人害怕吗?”展喜软中带硬地回答“小人害怕了, 君子就不会”。齐孝公惊讶地说: “你们的府库空虚得就像悬挂起来的磬, 四野里连青草都没有, 凭什么不害怕?”展喜回答道: “依仗先王的命令。从前周公、太公辅佐周室, 在左右协助成王。成王慰问他们, 赐给他们盟约, 说: ‘世世代代的子孙, 不要互相侵害。’这个盟约藏在盟府里, 由太史掌管。桓公因此联合诸侯, 解决他们之间的不和谐, 弥补他们的缺失, 救援他们的灾难, 这都是显扬过去的职责啊。等到君侯登上君位, 诸侯都寄予厚望, 说: ‘他会继承桓公的功业吧。’我敝邑因此不敢保城聚众, 说: ‘难道他即位九年就丢弃王命, 废掉职责, 他怎么向先君交代? 他一定

① 刘向集录:《战国策·东周·东周欲为稻》卷1,第9页。

② 胡壮麟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

③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僖公》(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15—320页。

不会这样的。’我们依仗这个盟约才不害怕。”^①齐孝公听了展喜的话后，马上鸣金收兵回国。

展喜的话语技巧在于：其一，没有任何谴责的内容，而是“犒劳”齐军。其二，“小人害怕，但君子不害怕”。这意味着鲁国是君子，所以不害怕。其三，“不害怕”的原因在于“先王之令”，先王遗训要求大家世代友好。其四，齐国若攻打鲁国就是违背“王命”，这是会被世人唾弃的。这后面两点乃“祖宗遗命”，因华夏民族有非常浓厚的“祖先崇拜”；同时，社会的秩序化正是由于“祖灵崇拜”与王权的结合所产生的^②。因此，展喜成功地说退了齐军。还有类似的一例发生在鲁僖公三十年（前630），秦国越过晋国而围攻郑国并想要灭掉它。郑大夫佚之夫前劝：“灭郑若对秦有利，你就进攻吧。但毁了郑，秦远而不可得郑之土地，必归晋。晋强则威胁秦，秦之害也。”结果，秦不仅没有灭郑反而与郑订了盟约。^③佚之夫的话语技巧则一直是从对方利益着想：其一，是否对秦有利？其二，灭掉郑必然壮大晋，这将对秦国最大的伤害。这两点就足以让秦国感到如芒刺背。因此，秦国最后不仅没有攻打郑国，反而还与郑国悄悄结盟，共同遏制晋国。这也充分体现了话语的力量。

五、结论与启示

一般来说，在国家间关系问题上，国家安全一旦陷入危机，就会想到甚至直接以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即便面对话语攻击所导致的舆论危机，在论辩的时候双方在用词上都咄咄逼人、唇枪舌剑。殊不知，这种方式可能导致武力冲突，这并不符合双方的利益。本文在追述古代国家或诸侯国之间的安全博弈时发现，不少危机是通过话语技巧得到有效解决的。既然话语能够解决，就尽量不要诉诸武力，语言和话语是人类拥有最方便的交流工具，也是一种最美的化解矛盾与风险的工具，当然也是成本最低的工具。语言与话语彰显了人类文明的高度，成功的外交家总是乐意用语言和话语来跟所有人打交道，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彰显国家的良好形象。即便是军事家考虑作战问题的时候，也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上策，所谓“攻心为上”，不使用武力便让对方臣服，这是人类战争文明、军事文明的彰显，也是人类走出丛林法则最重要的体现。

人类有爱好和平的天性。霍布斯的第一自然律就指出：“每一个人只要有获得和平的希望时，就应当力求和平。”而“力求和平”就是人类爱好和平、追求和平的天性和理性。只有“在不能得到平时，他就可以寻求并利用战争的一切条件和助力”^④。不过“利用一切条件和助力”也依然是为了和平，这仍然是人类爱好和平的天性和理性的体现。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指出：“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⑤简言之，武力是不能达到最终目标的。康德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和巨大摧毁性，指出：“即使在战争中，对于敌人的思想方式也还得保留某些信任，否则的话就会连任何和平条约都可能缔结不了；于是敌对行动就会以一场灭绝性的战争而宣告结束。”^⑥这同样表明人爱好和平的天性和理性的重要价值。这些情况表明，无论是在安全危机之前还是在战争过程中，语言、话语对促进和平与合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在人类告别丛林法则以后，战争还作为解决安全危机的工具和手段，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没有使用好语言的功能，也没有施展好话语的技巧，相反是把语言的功能滥用于对方，并发挥到极点。这实在是愧对语言之美和话语之妙。

在外交上，语言和话语的妙处就在于：始终为对方着想，但实现的却是自己的国家利益。本文没有使用战国时期纵横家如苏秦、张仪作为说客的案例，原因是本文主要是围绕国家（诸侯国）安全危机的处置来分析话语技巧的重要性，因而不涉及这些安全危机的案例就没有放在本文之中。本文上述案例，无论是成汤、周武还是屈完、展喜等，都以谦和之话语来对待处于爆发临界点的安全危机，最后也都能

①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僖公》（修订本），第479—481页。

②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3页。

③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僖公》（修订本），第525—526页。

④ [英]霍布斯：《利维坦》，第98页。

⑤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77页。

⑥ [德]伊曼纽尔·康德：《永久和平论》，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够化危为机、转危为安。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仅掌握了话语技巧，还抓住了支撑具体话语的关键性要素，从而牢牢地掌握着事态发展的主动权。

当前，社会普遍都认为话语权是要抢占的，但对以什么来抢占话语权却未必都清楚。强者并不一定就能抢占到话语权，弱者并非就无法获得话语权。那么，支撑话语权的東西究竟是什么呢？一般而言，支撑话语权的東西是理论，而理论来自知识谱系和文化。知识谱系越完善，理论就越丰满，立足于这样的知识谱系和理论体系，任何人都能够获得话语权，在这种基础上的话语就越有穿透力。但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中，话语权实际上不是靠抢占的，而是要对基于当时语境之下的关键性要素做出选择。这些要素无非或者是“天命”“先王之命”，或者事关涉合法性、正统性，或者是最关键的利益，或者是对方的现实软肋，或者是借信息不对称而以假乱真，等等。话语技巧实施的效果是检验话语权最重要的标准，如果话语没有产生效果，或者话语功能没有达到言语者的目标，都不能表明他掌握着话语权。因此，对于话语而言，与其毫无章法地去抢占所谓的话语权，还不如以抓住话语的根本要害以话语技巧来达到话语的目标效果，这才是真正的话语权所在。

最后必须要说明的是，外交话语技巧化解国家安全危机虽然是外交常态，但在国家安全的维护上绝对不是唯一的手段，而是尽可能减少安全成本的重要手段，它所彰显的是人类的文明和理性。然而，在话语技巧无法化解安全危机的情况下，冲突与战争成为必然的时候，那么话语就必然自动退出博弈，代之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必然是军事实力。换言之，不能把话语技巧视为万能的博弈手段。

Diplomatic Discourse Skills and Resolu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Crisis

HU Jian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701)

Abstract: People who are accustomed to “the law of the jungle” generally believe that the key means to resolve the national security crisis is the strength of the country or even just force. However, national strength is not the only means to ensure national security and resolve security crises. The “security dilemma”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hows that, apart from national strength, there are more effective means to resolve the national security crisis, namely the use of discourse skills and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plomatic discourse, national security crisis can be roughly identified as: public opinion attack, economic sanctions, war threat, military encirclement. In these four aspects, even in the military encirclement where war is most likely to occur, as long as the war has not started, diplomacy will not stop, and the possibility of discourse to resolve the security crisis still exists. The way of discourse to resolve security crisis mainly lies in the use of discourse skills, that is, to embed discourse skills in diplomatic statements, persuasions, debates, rebuttals and other discourse practices to make impossible peace possible and possible war impossible, thus greatly reducing the cost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Keywords: Diplomatic Discourse, Discourse Skills, National Security, Security Crisis, National Security Cost

[责任编辑：陈慧妮]